

拾遺

叶圣陶的扛鼎之作

1894年10月28日，叶圣陶出生于江苏省苏州市的一个贫寒家庭。1911年中学一毕业，便到苏州用直镇当小学教师养家糊口。

叶圣陶在小学任教期间，将所写小说投给《小说丛报》《礼拜六》《小说海》等期刊，篇篇皆能刊出。小说内容大多显露了写实主义倾向，不同于当时流行的娱乐文学。

由于在学校受到排挤，1921年他离开了直镇小学，先后到上海公学、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北京大学预科等校任教，并一直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期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隔膜》。这是新文学继郁达夫的《沉沦》之后的第二本小说集。

次年，他的第二本小说集《火灾》出版，足见他的创造热情有多高。

1928年，叶圣陶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在《教育杂志》上发表后，受到文坛的广泛关注。这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早出版的长篇小说之一，是叶圣陶创作道路上的里程碑。《倪焕之》成功地塑造了倪焕之

这个有血有肉的进步知识分子形象，并通过他，展示那个时代广阔的画面，给黑暗中前进的青年人以教育与启迪。

那时，创造社、太阳社一群作家正在与鲁迅就“革命文学”问题展开争论，并发展到群起“围剿”鲁迅的混战时刻。《倪焕之》的问世，无疑给当时的文学创作实践，提供了一个堪称“革命文学”范本的文本。或者说，没有参与“革命文学”争论的叶圣陶，以这部反映时代脉搏、富有历史深度和充满生活气息的小说，阐述了对“革命文学”的理解。

茅盾在《读〈倪焕之〉》一文中说：“把一篇小说的时代安放在近十年的历史过程中的，不能不说是第一部；而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大潮所激荡，怎样地从乡村到都市，从埋头教育到群众运动，从自由主义到集体主义，这《倪焕之》也不能不说是第一部。”茅盾高度评价叶圣陶完成了一项“扛鼎的工作”。（据《人民政协报》）

蔡元培：给校工涨工资

蔡元培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主政北大期间，求贤若渴，向全国聘请一流学者任教授与讲师。一时间，辜鸿铭、胡适、陈独秀、梁漱溟、周作人、刘半农等都来到了北大，北大可谓大师云集，人才济济。

一段时间后，蔡元培发现，北大作为中国的一流大学，学生众多，仅有大师是不够的，还需要背后默默奉献的校工，后勤补给这块的任务特别繁重。清晨，校园的第一声钟由一个校工敲响。只要是上学期间，无论刮风下雨，敲钟的校工准时到岗。每天如此，从来没有缺席过。冬天天气特别寒冷，学校需要烧煤取暖。烧煤的校工早起晚睡，保证按时供暖。学校的电工，他们不仅在学校维修，教授家

里的电灯、电话出了问题也找他们。还有那些打扫卫生的校工，他们每天往往是披星戴月……在北大，最辛苦的人就是这些校工。

蔡元培要让普通劳动者——校工也要活得有尊严、有奔头、有希望。所以他决定给校工涨工资。消息传出，在北大校园惹起了争议，有些教授认为校工的工作没有技术含量，应该拿低工资。

蔡元培力排众议，他说：“虽然校工没有文化，但他们投入了同样的甚至更多的时间成本。北大光有大师是不够的，还有背后默默奉献的这些校工，我们应该记住他们。”工资涨了后，校工的积极性提高了，工作热情特别高。另外，蔡元培每次迈进学校大门，他都会摘下礼帽，向迎接他的校工们鞠躬致谢。（据《天津日报》）

瞿秋白的幽默

20世纪30年代初，瞿秋白在上海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与鲁迅先生并肩战斗。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在《忆秋白》中写道：“秋白就在这短短几年中（1930年8月至1934年1月），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的威胁下，在地下的流浪生活中，把自己的心血放进新文学中去。”后来，茅盾有诗说：“左翼文台两领导，瞿霜鲁迅各千秋。”诗中的“瞿霜”就是指瞿秋白，可见瞿秋白在左翼文化战线上的重要贡献。

尽管生活在白色恐怖之中，瞿秋白也不失幽默。在瞿秋白与郑振铎之间，曾发生过以印章代贺礼的趣事。

瞿秋白是多面手，治印水平很高，在文化人圈子里很有名气。当时，郑振铎要跟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的女儿高君箴结婚，婚礼要按“文明结婚”的仪式操办，双方父母都要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郑振铎考虑到自己母亲没有私章，于是想到瞿秋白，想请他刻一方印。郑振铎给瞿秋白写了信，表达

了这个意思。没想到瞿秋白回了他一张“秋白篆刻润格”：石章每字2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2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瞿秋白开出的润格是50元。郑振铎一看傻了眼，找你刻个章急，秋白你怎么能还明码标价呢？算了，不找你了，于是转而托茅盾刻了一方备用。不料婚礼那天上午，有人送来了一个大红喜包，上面写着：“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落款是瞿秋白。郑振铎打开喜包，没看到钱，乃是三方青田石印章。一方是给郑老夫人的，其余为新郎新娘一组对章，边款上分别刻了两个字：“长乐”。新郎新娘都是福建长乐人，而长乐两字又暗含祝新人长久快乐之意。郑振铎喜出望外，然后仔细算了一遍：三枚印章共12个字，每字两元，共24元。因急件加倍，成48元。再加边款两元，正好是“贺仪五十元”。（据《人民政协报》）

古代风筝功能多

清代诗人高鼎《村居》中的“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无疑是名头最响的有关放风筝的诗句。诗中的“纸鸢”，即风筝，古时称“鸢”，北方谓“鸱”。关于风筝起源的说法有多种，既有斗笠说、树叶说，认为风筝的出现是受风吹起的斗笠、树叶的启发，还有帆船、帐篷、飞鸟说等。观点虽不一，但风筝很早便出现在中国，则是毋庸置疑的。

古人发明“风筝”最初主要是军事需要，承担侦察、通信甚至求救的功能。唐段成式笔记小说《酉阳杂俎》续集卷四引《朝野僉载》说，六国时公输班（鲁班）“制木鸢以窥宋城”。《南史》卷八十八“侯景传”也记载了风筝承担“无人飞机”的功能，侯景作乱，武帝被困于梁都建邺（今南京），内外断绝，有人献计制作纸鸢，将皇帝诏令系在其中，当时太子简文在太极殿东，乘

西北风放飞风筝向外求援，不幸被叛军发觉射落。

唐宋时期，风筝逐渐从军事用途转变为娱乐工具，且随着造纸术的发展，纸糊的风筝逐渐增多。唐代诗人高骈的《风筝》说：“夜静弦声响碧空，宫商信任往来风”，其中的“弦声响碧空”说明唐代的风筝带弦，放飞之后可鸣发悦耳的声响；南宋诗人陆游笔下的风筝则尽显闲适和童趣：“竹马踉蹌（踉跄）冲过去，纸鸢跋扈挟风鸣。”清代文学家孔尚任曾为无风放风筝而焦虑不安：“人夸你春来早，欠我风筝五丈风。”

不过，清代文学家曹雪芹则赋予放风筝另一项功用，即借花红柳绿之时，通过风筝把过去一年的不顺、晦气放飞出去。在民间，流传这样的风俗：看见别人风筝落下，一般人不会去捡，因为那是别人的晦气，捡了就等于收了别人的晦气。（据《西安晚报》）

1950年的宁夏劳动竞赛

滕鲁平

解放初期，宁夏各个部门的工作都处于接管整顿和创建阶段，国民经济尤其面临严重的困难，亟待从解决迫切问题入手逐步展开。银川市军管会随后成立的宁夏省党委和人民政府，在全力抓好没收官僚资本的基础上，深入清匪肃特，摧毁保甲制度，稳定物价，巩固社会秩序，经过艰苦的工作，创办了首批国营企业，大力恢复和发展生产，广泛厉行节约，使其逐步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

宁夏档案馆馆藏宁夏省总工会全宗一件“宁夏省工人迎接国庆节生产竞赛总结报告”中，记录了宁夏解放一年来开展的首期劳动竞赛——1950年宁夏工人同西北各省工人一样，以实际行动迎接第一个国庆节和宁夏解放一周年，有领导、有组织、有重点地展开了从9月11日到11月11日为期两个月的首期生产竞赛运动，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感到当家做主的地位和自豪。首期劳动生产竞赛，对于扩大企业生产，恢复国民经济，保障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的供应急需具有重大意义。

1950年8月底，宁夏省总工会召开了银川各厂工委会主任，生产委员座谈会，研究、讨论了各基层工会如何领导生产竞赛的方法，号召各厂工会，团结动员职工群体，密切配合党政搞好生产竞赛，并保持这次竞赛中所获得的成绩。

银川市造纸厂、人民机器厂、人民电厂、印刷厂、修理厂、皮毛厂、制药厂、军服厂，平罗县的新华瓷厂，9家企业均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以克服困难，

提高产量，改进质量，降低成本为目的，定出了竞赛计划。当各厂党政订出生产计划后，各工会即召开委员会讨论生产计划，并研究如何动员职工，保证完成任务步骤。

新华造纸厂根据厂党制定的生产计划，先以口头与黑板报传出了生产竞赛的消息，给全场职工以精神动员，指出了职工努力的方向，在会员小组会上，大胆放手发扬了民主，让全体会员讨论了任务，委员们先订出自己的任务做样子，然后帮助会员定出了组、个人的任务；电厂的机务组保证要美观坚固，不浪费材料，不发生危险地安装好南门至北门间的高低压线路；造纸厂全体会员保证完成并超过行政所给的任务，在一个月竞赛中数量质量是全组之冠；印刷厂浇字部主任王广生，工作埋头苦干，竞赛中仿造了模壳子装铜模子用，节省了8万元，浇字由竞赛前每小时平均615个增至982个；人民机器厂的工友申长江也实现了他的保证节省煤由解放前的日烧700斤，减至500斤，在竞赛时，日定标准470斤，他只烧了450斤，一月内共节省煤600斤，比解

造纸厂的造纸组全组团结友爱，遵守劳动纪律，不迟到早退，在竞赛中因机器坏了耽误任务一天半，在抢修机器的夜里，他们很关心机器的修理，曾三睡三起准备上工生产，在造纸组工作精神的影响下，带动了其他组也提前一天完成任务，在全场7个生产小组中被评为模范组；机器厂的铁工组，在全组工友的细心钻研下改进了生产工具，计划制八分之五生产螺丝500条，标准工时是54小时，结果只用了14小时。在生产中工人们发挥了高度的主人翁精神，涌现出劳动模范都站在生产战线的最前面。造纸厂推水淤组史文汉经常完成行政上所给的任务，在一月竞赛中数量质量是全组之冠；印刷厂浇字部主任王广生，工作埋头苦干，竞赛中仿造了模壳子装铜模子用，节省了8万元，浇字由竞赛前每小时平均615个增至982个；人民机器厂的工友申长江也实现了他的保证节省煤由解放前的日烧700斤，减至500斤，在竞赛时，日定标准470斤，他只烧了450斤，一月内共节省煤600斤，比解

放前节省了7500斤，节省的主要原因是给锅炉炉上水，烧过的煤渣筛过再烧，一点也不浪费。在生产竞赛的过程中，党政领导干部明确了依靠工人群众搞好生产竞赛的思想，各厂都选出模范组，这些组在各厂的经常生产与生产竞赛中都起了决定带头作用，大胆的把任务交给了工会，各厂工会也做了教育工人和发展会员等工作，职工觉悟进一步的提高，造纸厂工会协同行政给工人做了棉衣，并发展了11个会员。

刚刚获得解放的宁夏，经济落后，百废待兴，各级党组织担负起了领导各族人民建设新宁夏的重任。宁夏首期劳动竞赛，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砥砺奋进的艰苦创业精神，反映了工人阶级以翻身做主人的姿态积极投入到国民经济建设中的昂扬斗志，诠释了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群众具有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

（作者单位：宁夏档案馆）



红色百卷 奋斗百年

雪山下的纪念碑 传颂“两路”精神

西藏拉萨西郊河畔，静静矗立着一座三棱形的高大纪念碑——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纪念碑旁，青松挺拔。

站在庄严肃穆的纪念碑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筑路精神直击人心。67年前，11万名筑路军民怀着“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的信念，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卧冰雪、斗严寒，用简陋的施工机具，在青藏高原上修通了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结束了西藏没有现代公路的历史，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

解放西藏初期，毛泽东同志号召部队“一面进军、一面修路”。1954年5月，时任西藏运输总队政委的慕生忠带领1200名骆驼工，人手一镐一锹，从青海格尔木向世界屋脊发起冲击。

在西藏军区军史馆里收藏着这样一把铁锹：前端的铲头锈迹斑斑，后端的木把已断裂腐朽。这是修筑川藏公路时，战士们使用的工具。此外，筑路军民手里的工具还有铁锤、钢钎和十字镐。

“二郎山的绝壁上，战士们把自己吊在近乎垂直地面的半山腰，一人扶着矐子，一人挥舞铁锤，以每公里牺牲7人的巨大代价，硬生生在峭壁上凿出了一条天路。”西藏军区军史馆讲解员李辰说。

修筑青藏公路时，慕生忠曾在铁锹把上刻下“慕生忠之墓”。他说，如果我死在这条路上，这就是我的墓碑。路修到哪里，就把我埋在哪里，头冲着拉萨的方向。

在雀儿山工地，年仅25岁的张福林被一块巨石砸中，倒在血泊中。连队指导员安排医生抢救，他却说：“我伤得很重，恐怕不行了，别给我打针了，为国家省一针吧！”

西藏八宿的怒江大桥旁，一座孤独的老桥墩静静矗立，往来车辆

经过时，总会鸣笛致敬。据十八军后人介绍，工兵5团一位战士修桥时过于疲惫，不慎掉入了正在浇注的桥墩中，成了永恒的纪念碑。

桥墩对岸的岩壁上，一幅《排长跳江图》石刻画清晰可见。据介绍，当年十八军162团一个排在怒江沟炸山开路，因谷狭难以躲避炸出的飞石，待完成炸山任务时只剩下排长一人，其余全部牺牲。排长悲伤不已，纵身跳入奔腾的怒江，追随战友而去。

雪山见证，这是两条用鲜血和生命铺筑的天路。

1954年12月25日，川藏公路与青藏公路同时建成通车。穿越世界屋脊的两条公路，宛如洁白的哈达，将雪域高原与内地紧紧连结在一起。全长4360公里的公路沿线，为筑路而牺牲的3000多名战士，化为天路上永恒的丰碑。

沐浴着高原的金色阳光，川藏青藏公路纪念碑熠熠生辉。碑文写道：十一万藏汉军民筑路员工，含辛茹苦，餐风卧雪，齐心协力征服重重天险。挖填土石三千多万立方，造桥四百余座。五易寒暑，艰苦卓绝。三千志士英勇捐躯，一代业绩永垂青史……

几十年来，在建设和养护川藏、青藏公路的过程中，形成和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

如今，川藏公路、青藏公路、青藏铁路、沿线机场，还有通乡的油路、通村的硬化路，构筑起便捷、高效的进出藏立体交通网。

“以川藏、青藏公路等为交通纽带，西藏同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西藏大学教授图登克珠说。

（新华社拉萨4月22日电）

陆游读书不停歇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首诗可视为74岁的陆游向21岁的小儿子陆聿传授“阅读法”，即要从书本和实践中获取知识，也启迪每一位读者读书做学问要孜孜不倦、持之以恒。

纵观陆游一生，无论仕途多么坎坷，他勤读不怠的态度从未改变，并留下约250首与读书有关的诗，其中诗题中有“夜读”二字的高达67首，正如他在《冬夜读书》所言：“挑灯夜读书，油滴意未尽。亦知夜既分，未忍舍之起。人生各有好，吾癖正如此。”1165年，40岁的陆游在《秋夜读书每以二鼓尽为节》中写道：“腐儒碌碌叹无奇，独喜遗编不我欺。白发无情侵老境，青灯有味似儿时。”该诗首联自叹为“碌碌无奇”的“腐儒”，只喜有古人的遗书可读，尽管诗笔平平，却蕴含他有不屑与世浮沉，坚持得自“通编”的“济世”理想之意。

淳熙四年（1177年），53岁的陆游在成都写了一首《读书》七绝：“归志宁无五亩园，读书本意在元元。灯前目力虽非昔，犹课蝇头二万言。”这首诗如同陆游的学习体会，既反映了诗人在年老时仍坚持读

书、苦学的情景，又表明他读书学习是为平民百姓而并非无他求的可贵精神。

陆游63岁时作的《冬夜读书》：“退食淡无味，一窗宽有余。重寻总角梦，却对短檠书”，67岁时作的《五更读书示子》：“床头瓦檠灯煜爚，老夫冻坐书纵横。暮年於书更多味，眼底明明见莘渭”，70岁时作的《读书》：“平生爱客如爱书，力虽不逮意有余。

而75岁时作的《冬夜读书示子聿》：“圣师虽远有遗经，万世犹存旧典型。白首自怜心未死，夜窗风雷一灯青”，77岁时作的《自勉》：“臂弱传钞少，心烦记问衰。读书犹自力，爱日似儿时”，81岁时作的《读书示子局都都通》：“读书则未置，忍饥讲唐虞。古言不吾欺，岁晚於汝食”，84岁时作的《读书至夜分感叹有赋》：“老人世间百念衰，惟好古书心未移。断碑残刻亦在椽，时时取玩忘朝饥”，85岁时作的《读书》：“少从师友讲唐虞，白首襟环不少舒。旧谓皆当付之酒，今知莫若信吾书”等，则进一步彰显朴素的读书生活与爱书情怀贯穿了陆游一生。

（据《福建日报》）

溯源

何谓十八般兵器

“十八般兵器”的说法源于“十八般武艺”，并不见于中国古代正规史书，只在笔记杂文、小说戏曲中有所提及，且有很多种不同的说法。

明代有人认为，十八般武艺指弓、弩、枪、刀、剑、矛、盾、斧、钺、戟、鞭、铜、挝、叉、叉、耙头、锦绳套索和白打。但白打指的是拳术，不是兵器，因此所推出的兵器只有“十七般”。

《水浒传》第二回提到十八般武艺，有矛、锤、弓、弩、铙、鞭、铜、剑、链、挝、斧、钺、戈、戟、棒、牌、枪、扒。

京剧《打渔杀家》中介绍的大十八般武艺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铙、棍、槊、棒、鞭、铜、锤、钺、拐子和流星；小十八般武艺则是手擗子、小擗子、拦马槌、虎头钩、双手带、二人夺、铁尺、杆棒、梢子棍、三截棍、七节鞭、金镖、银镖、毒药镖、弩弓、袖箭、五色飞蝗石和紧背花装弩。

实际上，在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用的兵器都不尽相同，要想以十八般兵器全部概括是不可能的。（据《天津日报》）